

“含泪的笑”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叙事方式

刘玉宝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30024)

摘 要: 久经磨难之后, 索尔仁尼琴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长达 10 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之苦, 将会使他带着怎样激愤的情绪来大肆渲染自己的切肤之痛和时代的浓浓悲情呀! 然而, 通读之后, 《一天》给我们营造出的却是另一种氛围——“含泪的笑”。这一独特的创作风格是如何表现的, 这种独特的悲喜剧效果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解读文本之后, 人们知道: 索尔仁尼琴从平静得近乎淡漠的叙事角度出发, 运用调侃、诙谐的喜剧式叙事语言, 形象地阐释了一个具有高度哲理意蕴的生命主题。

关键词: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叙事方式; “含泪的笑”

中图分类号: H106.4

文献标识码: A

1962 年, 苏联自由派文学杂志《新世界》月刊第 11 期上刊登了一篇名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小说, 作者是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小说所讲述的无疑是个催人泪下的悲剧故事。小说的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的一名普通士兵, 仅仅因为做过两天德军的俘虏, 在历经苦难逃回苏军的怀抱后, 等待着他的却并不是抚慰和拥抱, 而是更大的不幸——首先, 因被怀疑充当了法西斯的间谍而遭捕, 继而, 又被无端地判处了 10 年的监禁和苦役。在这个悲剧故事里, 有“作为富农之子”被净身逐出苏军而沦落天涯并最后身陷囹圄的 104 小队队长丘林, 有因二战期间曾跟英国海军上将交过朋友而在战后落入劳改营的原苏联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 有因同美国人在一起呆了两天便被判刑 25 年的谢尼卡和克列夫申, 有因笃信宗教而被判 25 年的阿廖什卡, 还有……

然而, 面对着这一个个无辜生灵的悲惨命运, 我们却欲哭无泪, 常常想笑, 却又不能。何以如此? 且让我们翻开姜明河先生的译文, 再次走进《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细细地解读文本吧。

著名的俄裔美国学者、俄罗斯文学专家马克·斯洛宁在评价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一天》时曾说: “索尔仁尼琴并不想使读者震惊。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既不夸张也不激愤地写了最令人恐怖的详细情况。行文生动幽默, 而这也也许更加强了他那叙述严谨, 具有特殊风格的作品的影响。”(马克·斯洛宁 1983:382)

的确, 在《一天》里, 同小说主人公有过类似悲惨经历的索尔仁尼琴, 严守着自身情感的闸门, 抛却了一切个人恩怨, 完全从一位公正的评判者的角度, 冷眼面对人间的苦难。在他无比轻松的叙事语言里, 既找不到大肆的诋毁和公然的责难, 也没有声泪俱下和慷慨悲歌,

然而，字里行间，却都是对人间苦难的制造者的严厉控诉，都是对人间苦难的牺牲者的深切同情。

先让我们看看作者是如何叙述主人公蒙受莫大的不白之冤的：

“根据档案材料来看，舒霍夫坐牢是由于背叛祖国。他供认自己想背叛祖国，所以当了俘虏，至于何以被释放归来，则是因为完成了德国的侦察任务。到底是什么任务，无论是舒霍夫本人还是法院检察官，都想像不出来。所以只好就写上‘任务’二字了。

“在反间谍机关里，舒霍夫受了很多刑。那时舒霍夫的打算很简单：不在口供上签字，就只有死路一条；签了字，也许还能再活几天。于是他就签了。”（索尔仁尼琴 2000:53）

再看作者是以怎样一种叙述语调来陈述 104 小队队长遭受到悲苦难言的飞来横祸的：

“队长那有麻点的脸被炉火映照着。他毫无悲痛地讲述着，仿佛事情与自己无关……”（索尔仁尼琴 2000: 69-70）然而，他讲述的却正是自己的悲惨经历：一名“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优秀战士”、“头号机枪手”，在 1930 年，“只有 22 岁”的时候，“作为富农之子”，以“想欺骗工农政权”的罪名，“被开除军籍”。“……外面正是 11 月的天气。他们剥下我身上穿的冬季军装，只给了一套单衣、一双回收过两次的袜子和一件又短又小的军大衣……不发给我乘车证，就连一天的口粮也不给。让我吃了最后一次午饭，就把我撵出了军营。”（索尔仁尼琴 2000: 68）

还有一段描述劳改营里众生相的文字：

“苦役犯的思想——那也是不自由的。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上来，翻来覆去地想：褥垫里的那份口粮会不会被摸到？晚上医务所会不会给病假呢？关还是不关中校的禁闭？采扎尔的那件绒布衬衣到底是怎么弄到手的？大概他是买通了私人物品储藏室的管理员，否则能从哪儿弄呢？”（索尔仁尼琴 2000:30）

仅从上述的几段摘录中便可看出，作者始终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用平静得足以使人怀疑是淡漠的眼光审视着人间所发生的不幸：无论是莫大的不白之冤，还是悲苦难言的飞来横祸，抑或是苦役犯们被奴役、被牢牢禁锢着的思想。作者似乎戴着一副滤色镜，把天地之间的所有色彩一一挡在了镜片之外，只允许黑白两色进入眼底来勾勒事物的轮廓。然而，恰恰是这种客观而平静得近乎淡漠的叙事角度，也恰恰是因此而被选用的不添加任何感情色彩的白描手法，使作者的叙述显得更为真实，使这出悲剧更具感染力。

构成《一天》独特的叙事方式的，不仅仅是作者所选取的平静甚至淡漠的叙事角度和由此而来的无任何感情色彩渲染的白描手法，更有作者所运用的或调侃、或诙谐、或抒情的叙事语言，以及由此而营造出的喜剧氛围，从而建构了以喜剧方式来表现悲剧灵魂、用笑来包装哭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和创作风格。

请看苦役犯们在接受出工前的搜查时的一段情节：

“舒霍夫身上穿的都是公家发的衣服，尽管摸吧，——胸脯，还有一颗心。给采扎尔记上的是一件绒布衬衫，而布伊诺夫斯基身上，则是一件背心或者肚兜之类的东西。布伊诺夫斯基总是大嗓门说话，他在自己指挥的驱逐舰上习惯了这样，来到劳改营还不到 3 个月，此刻他嚷道：

“‘你们没有权利让人们在冰天雪地里脱去衣裳！刑法第九条的规定你们不懂！……’

“他们有权利。他们懂得。只有你，老兄，还不懂呢。”（索尔仁尼琴 2000: 26）

再看下面一段描写：

“纵队走过犯人们建造起来的木工厂，走过居住区（木房也是犯人盖的，住的却是管理人员），走过新俱乐部（从地基到墙上的装饰，也统统是犯人的劳动，可电影却只给管理人员看），然后顶着风，迎着渐渐泛红的东方踏上了原野。左面和右面都是一望无际的茫茫白

雪，雪野上连一棵小树都没有。”（索尔仁尼琴 2000: 30）

还有主人公对法律的“朴素”认识：

“使舒霍夫感到愉快的是，大家都那么指着他，说他的刑期快要满了，然而他自己并不十分相信。瞧，那些在战时就已刑期满了的人，一直被关到 1946 年特赦时才释放。有的人刑期只有 3 年，结果却关了 5 年。所谓法律，也就是随心所欲。10 年满了，还会告诉你，得再来上 10 年。要不就把你流放到别处去。”（索尔仁尼琴 2000:52）

如果说在以上所引的几节文字中，作者运用的是更倾向于调侃意味的叙事语言的话，那么，在以下所选取的小说片段中，其叙事语言则更接近于诙谐的风格。

片段之一：

“伊万·杰尼索维奇在劳改营和监狱里蹲得已经不习惯于思考如何安排明天，如何安排一年以后的生活，以及用什么养家的问题了。一切都由上头替他考虑，这样似乎倒也轻松。”（索尔仁尼琴 2000:32）

片段之二：

“风在空旷的原野上呼啸，夏天刮干燥的风，冬天刮凛冽的寒风。在这样的荒野上是什么也不生长的，而在这块四周都安上了铁丝网的地方，更是草木不生。面包是从一台切面包的机器里长出来的，燕麦则是从一座粮仓里长出来的。在这里，哪怕你累断了腰，不顾死活地干，从地里也打不出一粒粮食……”（索尔仁尼琴 2000: 57）

片段之三：

“经过晚上这种反复清点之后，犯人们穿过劳改营的大门回来了，他们吹了一天风，又冷又饿。晚饭时那一长柄勺稀稀的热菜汤，对犯人来说，真好比久旱逢甘霖，一口就能喝个精光。对他们来说，此刻这一勺汤，比自由、比过去和未来的全部生活还宝贵。

“犯人们像出征归来的战士，迈着整齐而响亮的大步，走进劳改营的大门，随后就靠边走！”（索尔仁尼琴 2000: 106）

在下面的一场对话中，作者使用的便是最为典型的抒情性叙事语言。这场对话是在整整一天的劳累之后，在劳改犯们饥寒交迫地等待离开工地前的查验人数时，在农民出身的舒霍夫和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之间发生的。为保留情节的完整性，恕笔者全文引用如下：

“一切都很顺利，舒霍夫感到心情愉快，他轻轻碰了碰海军中校的腰，向他提了个问题：

“‘喂，海军中校，根据你们的科学来说，往后旧月亮会跑到哪里去呢？’

“‘怎么跑到哪里去？无知！只是看不见罢了！’

“舒霍夫摇着头笑：

“‘既然是看不见了，那你怎么知道它还有没有呢？’

“‘那么，照你的意思来说，’海军中校十分诧异。‘每个月都出来一个新的月亮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人都是每天在生，那么月亮 4 个礼拜生一个就不行吗？’

“‘呸！’海军中校啐了一口。‘我还从未见过这样一个愚笨的水兵呢。那么旧月亮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呢？’

“‘这我正是在问你呀，它到哪儿去了？’舒霍夫咧着嘴笑，露出了牙。

“‘什么？到哪儿去了？’

“舒霍夫舒了口气讲述道，故意把有的字母的音发得不太准：

“‘我们家乡都是那么说的：上帝把旧月亮揉碎，使它变成一些星星。’

“‘多没有文化！’海军中校笑道。‘真少见！这么说，舒霍夫，你信上帝？’

“‘为什么不信？’舒霍夫十分惊讶。‘比如打雷，你还能不信！’

“‘那么，上帝做这事是为了什么呢？’

“‘做哪件事？’

“‘把月亮揉碎，做成星星，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唉，这有什么难懂的呢！’舒霍夫耸了耸肩膀。‘星星时常往下掉，需要补充嘛。’”
(索尔仁尼琴 2000: 89-90)

在《一天》中，有一个颇为独特之处，这就是作者对主人公“吃”的描写，细微之处，甚至不惜笔墨，大肆渲染，其叙事语言同样充满了调侃、诙谐的喜剧色彩，也不乏抒情意味。在此，笔者特别提出，以求解读作者的一番良苦用心。且看：

“如果菜汤热气腾腾，倒也令人高兴，可眼下舒霍夫所得到的菜汤却冰冷冰冷。不过他还是慢吞吞地、全神贯注地吃了起来。这种时刻即使房顶着火也不必着急。如果不算做梦的话，劳改营里的犯人只有吃早饭的 10 分钟、吃午饭的 5 分钟和吃晚饭的 5 分钟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的。”(索尔仁尼琴 2000: 12)

这是主人公的第一次“吃”。

“舒霍夫已经把粥吃完了。因为他一开始就敞开肚皮吃，准备让自己的胃接受两份粥，所以一份粥下肚之后，跟每次吃燕麦粥一样，一点也不觉得饱。这时，舒霍夫把手伸进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把包在白布头里的那块没有冻硬的半圆型面包皮取出来，小心翼翼地用它去抹沾在盆底和盆边上的燕麦粥糊。抹到面包皮上之后，就用舌头去舔，然后再舔，再舔。最后，饭盆像洗过那样干净，连一点粥的痕迹都没有……”(索尔仁尼琴 2000: 62)

这是主人公的第二次“吃”。

主人公一天中的最后一次“吃”，作者描述得最为精彩：

舒霍夫不无目的地在取邮包的地方替他的难友采扎尔排队。

“舒霍夫告诉他谁排在谁后面，接着没等采扎尔自己提起晚饭的事，他就问：

“‘那么晚饭要给您带回来吗？’

“(这就是说，把饭放在饭盆里从食堂带回营房。本来这是严格禁止的，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明文规定。一旦被抓住，就会把饭从饭盆里倒到地上，而且还要关禁闭，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往外带，而且往后还会带，因为有的人有事情，根本来不及跟小队的人一起到食堂去。)

“舒霍夫虽然问了要不要带晚饭，心里却想：‘莫非你真的要当小器鬼？不把晚饭赏给我？你明知晚饭没有粥，光有稀菜汤！……’

“‘不用，不用，’采扎尔微微一笑，‘你把我的那份吃了吧，伊万·杰尼瑟奇！’

“舒霍夫所期待的正是如此！这时，他像一只自由的鸟儿，从外室棚顶下飞出，在劳改营这块天地里飞翔，飞翔！”(索尔仁尼琴 2000: 110)

舒霍夫在为了“吃”而一心二用：

“在这么拥挤的地方，只端一盆儿汤而不洒出来，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他现在端的是 10 盆儿。最后他终于把托盘轻轻放到戈普奇克事先占好了的桌子角上，托盘里没有一点新溅上的汤水。他还考虑到，托盘怎么转才能使其中最稠的两份正好对着自己此刻要坐的地方。”(索尔仁尼琴 2000: 117)

舒霍夫在体味“吃”的幸福和“吃”的哲学：

“他开始吃起来，开头只是喝稀的。几口热汤下肚，全身都暖和了，仿佛整个内心都颤动了起来迎接稀汤。太好了！这就是犯人赖以活下来的那短暂的一瞬。

“此刻舒霍夫一无所怨：既不怨刑期太长，又不怨一天的时间太长，也不怨星期日又被取消。此时他想的是：能熬得过去！上帝保佑，能熬得过去，一切都能熬到头！”(索尔仁尼琴 2000: 118)

这就是主人公的第三次“吃”，最为抒情，也最具喜剧性。

为了能吃到嘴里，主人公几乎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心智；只要能吃到嘴里，一切的痛苦和

不幸就会被主人公忘之脑后。在不假思索之时，我们只看到“吃”成了主人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惟一的幸福，仅存的希望，不免为之唏嘘慨叹——人竟成了有心智的动物，只剩下了生存的本能吗？在认真解读之后，从小说诙谐、幽默的叙事语言里，我们却读出了作者的一番良苦用心——一个无比悲壮的哲理：仅在一盆稀汤或麦粥的面前，人的敏感而丰富的情感就会变得麻木、迟钝，这是比主人公的不幸命运更大的悲剧；只要有一盆稀汤或麦粥，人就能熬过肉体和精神实难承受的苦痛，这是比稀汤或麦粥所能给予人的更大的生命的力量。

在小说里，作者用了整整 140 个页面（以姜明河先生的译文为计）的篇幅来叙述主人公在劳改营中一天的生活——从早晨 5 点起床的号令响起到晚上 10 点两次点名之后，而“在他的刑期内，从头到尾这样的日子要有 3653 天。因为闰年的缘故，所以格外还得加上 3 天……”（索尔仁尼琴 2000: 140）

相对 3653 天而言，这一天既十分短暂，又无比漫长。在这一天里，作者既高度地浓缩了小说人物所处的时空，又细腻地展现了小说人物的心路历程。在这一天里，有惊，有险，有喜，有忧，有绝望，更有希望，面对着难以逃脱的茫茫苦海，却抒发着内心浓浓的诗意，置身于已低级到了负数的、非人的生存环境，竟仍保守着对生活的一腔乐观甚至高昂的热情。

即便是在小说的结尾，在回顾和总结主人公所经历的这“一天”时，作者笔端流淌出的依然是浓郁的乐观和庆幸：

“心满意足的舒霍夫渐渐进入梦乡。这一天他碰上了许多顺心的事：没有被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到‘社会主义小城’去干活，午饭时多得了一份粥，队长把百分比结算得很好，砌墙时很愉快，带回来那截锯条搜身时也没被搜出来，晚上从采扎尔那里挣到点东西，还去买了烟叶。而且也没有病倒，熬了过来。

“一天过去了，没遇上什么扫兴的事，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了。”（索尔仁尼琴 2000: 140）

作者在谈到小说的创作动机时曾说：“我知道，写自己要方便一些，不过，我觉得，写俄罗斯的命运更为重要。无数个伊万·杰尼索维奇遭受到的不幸，是俄罗斯所经受过的所有苦难中最为深重的。”（Н.А.Мяготеина 2000: 210-211）

《一天》浓缩了整整一个时代，伊万·杰尼索维奇代表着整整一个民族。《一天》的意义绝不仅在于它开创了俄罗斯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中营文学”，更在于它已升华到一个相当高度的哲理含意。这就是作者倾心讴歌的生命——笑对苦难便可无坚不摧的生命，这就是作者忠贞信奉的力量——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力量。

于是，在作者独特的叙事方式里，在我们欲哭无泪、欲笑不忍之际，我们解读出了这样一条真理：悲剧情境中的“含泪的笑”（调侃+诙谐+抒情）= 用轻松、乐观的态度笑对苦难 = 俄罗斯性格 = 俄罗斯民族的灵魂 = 生命。

参考文献

- [1] Мяготеина Н. А. 2000 100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 [2] 马克·斯洛宁 1983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3] 索尔仁尼琴 2000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北京: 群众出版社.

“Smile in Tears”

—— The Narrative in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LIU Yu-bao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After suffering a hard life for a long time, in 1962 Solzhenitsyn published his novel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One may assume that the ten years of imprisonment, reform through labor and banishment would have prompted him to describe his acute pain with grief and indignation. But he narrated the whole story in a jocular and humorous way. At the same time he seems so calm that we can almost use the word indifferent to describe him. In fact, however, what is under this calmness and indifference is actually the theme of the novel ——“the ability to survive”.

Key words: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 narrative way ; “smile in tears”

收稿日期: 2004-03-15

作者简介: 刘玉宝 (1962—), 男, 吉林人, 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化及俄—汉、汉—俄各种文体的翻译教学和研究。

[责任编辑: 刘 锐]